

古漢集書影

卷之三

古漢集書影

卷之二

古漢集書影

卷之四

古漢集書影

卷之五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六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七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八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九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十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十一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十二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十三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十四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十五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十六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十七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十八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十九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二十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二十一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二十二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二十三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二十四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二十五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二十六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二十七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二十八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二十九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三十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三十一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三十二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三十三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三十四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三十五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三十六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三十七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三十八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三十九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四十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四十一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四十二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四十三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四十四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四十五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四十六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四十七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四十八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四十九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五十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五十一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五十二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五十三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五十四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五十五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五十六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五十七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五十八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五十九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六十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六十一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六十二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六十三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六十四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六十五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六十六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六十七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六十八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六十九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卷之七十

古漢集書影

古漢集書影

佛曆二五二九年六月初版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71

(全一百冊)

定

價：新臺幣捌萬元正

本書作者：J. W. de Jong 等

本書譯者：霍韜晦、陳銚鴻

主編：藍吉富

版請勿
所翻印有

發行人：朱蔣元

出版社

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話：(02) 9426674 · 2477372
機：00-1762513號朱蔣元帳戶

歐美佛學研究小史 J. W. de Jong 著

佛教哲學——一個歷史的分析

D. J. Kalupahana 著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白聖大師序

近三十餘年來，台灣佛教之發展，頗有明顯之進步迹象。其中，佛書出版之日漸蓬勃尤為衆所週知之事實。

台灣光復之初，不唯大藏經難得一見，即或單行本佛書，亦為數甚少。然時至今日，單行本佛書充斥坊間書肆，藏經之流通於世者，乃有六、七部之多。與三十年前相較，真有天淵之別。

縱觀光復以來之佛書出版史，有三件大事最值得一提：

其一，為大正藏、卍續藏之再版。此二藏之流通使台灣佛學界輕易即可請藏，佛法之普及於知識分子間，此事居功甚偉。所惜者，二藏皆東瀛人士所編，吾人不過翻版而已。

第二件大事，則為張曼壽居士所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一百冊）之出版。該書為國人自編，且全部重新排版之佛教大叢書。內容匯集民初六十年之佛學研究成果，頗便初學。

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為新編新版，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故較乏新義，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自有所不足。此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鳩巨資

、開譯場，由藍吉富居士主編，選取國際佛學典籍百種，悉逐譯為中文，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亦更為艱難。謂之為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實非過甚之辭。

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朱居士索序於余，因贅數語，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

白雲

印順大師序

華宇出版社編譯出版「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共一百冊，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雖以日文作品為主，但內容是偏及各方面的。對於提昇國內佛學水準來說，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

我們中國佛教，過去經長期的翻譯、研求與闡揚，到隋唐而大成。這是以中期的「大乘佛法」為主，上通初期的「佛法」，下及後期的「秘密大乘佛法」。中國固有的佛教，基礎異常深厚，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適應現代，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各宗奧義，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抉擇而予以貫攝，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遺憾的是：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傳統的佛教界，又不能重視佛學。這才使國內佛教學的研究環境、研究水準，遠遠的落後於國外，無法適應趕上，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

我覺得，三十年來，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宗教自由，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對於佛教學的研究

發展，已有了可能性。「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在這時編譯發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增進研究的方法，特別是梵、巴、藏文——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這部書的出版，將促成國內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

序

星雲大師序

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列強，由於政治、經濟、宗教等因素，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西洋的佛學研究，即造端於此。其後，在漢學、東洋學、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佛教研究乃日漸興盛，終至有「佛教學」一門學科產生。

日本在十九世紀末、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近百年來，該國佛教大學成立數十所，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佛書之刊行量，亦為舉世所矚目。

像日本西洋這類佛教研究，大多站在學術、文化立場，是人本主義的。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巴、藏、漢等各種語文資料，以及史學、社會科學、考古學等方法。因此，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然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自是可以預卜。

華宇出版社近擬發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歐、美、日本佛學名著一百種，並悉譯為

中文。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值得隨喜。
朱蔣元居士徵序於余，乃略述數語如此。

星空

淨心大師序

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去探索佛教的內涵、發展及其影響。

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從印度部派佛教、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大乘之中觀、瑜伽、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都屬於這一類。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則起源於近代西方。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佛教學」。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從十九世紀以來，迄今爲止，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大環節，而爲歐、美，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

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對於傳統研究，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可惜，到近世以來，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教研究頗爲陌生，而且在傳統學方面，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比起曾受我國佛教孕育的東瀛佛學而言，也頗有遜色。這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佛教徒所樂見的。因此，如何振衰起蔽，該是目前大家所應共同

思索的問題。

這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籌印「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擬翻譯當代佛學名著一百種為中文。這一龐大的文化事業，恰好為「如何復興中國佛學」提出一種有力的方案。相信這部書的完成，將會為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其學術意義與價值，是值得讚揚的。

淨心

演培大師序

自釋尊涅槃之後，中印各國的佛教，由歷代大德繼續傳承。由這種傳統沿續下來的佛教，有一種共通的特質，即較偏重佛教義理的疏釋與推演，而忽略史實的研求與確認。這種特質固然使佛教義理形成龐大精深的體系，但是由於忽視歷史的精確性，也往往使後人對前後期佛法混淆不分。

近代日本、西洋的佛教研究，與上述傳統方式正好相反。他們大抵從史實的推求着眼。雖然在義理研求方面不如古人，但是對史實的重視，則較古人為甚。因此較能釐清佛法的歷史發展，而不致混淆。加上研究視野及範圍，都較前人寬廣，乃使「佛教研究」蔚成一大學術王國。舉凡文學、美術、音樂、史學、哲學、醫學、天文、歷法……等層面，都可以在佛教研究裏深入地涉及。

因此，儘管這種研究也有其缺失而不能完全仰賴，但是可資取法之處亦不算少。尤其我國佛學界在這方面頗為陌生，如能吸收進來作為國人研究上的參考資料，對我國佛學的推展，必有相當程度的貢獻。這次華宇出版社印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所選譯的一百部書，幾可謂為近代國際佛學成果的縮影。全書

出齊後，對我國佛學界的裨益，是可以預卜的。我很高興能見到這件文化壯舉的推出，並且樂於向國人推薦。

漁 緣

編者序

近百年來，國際佛學界有幾項重大的發展。其一為世界各地佛教歷史及內容的發掘。印度、中國之外，錫蘭、西藏、中亞（西域）、日本、韓國等系佛教的特色與價值，逐漸大白於世。乃使世人瞭解佛教的歷史發展，是如此波瀾壯闊；佛教的修持與義理，是如此龐大恢宏。

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大幅度革新。梵語、巴利語、藏語、華語的並行；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比較宗教學……等輔助學科的應用，使「佛教是什麼？」「佛教在人類史上曾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也逐步地得到解答。

由於研究範圍與視野的擴大，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使現代佛教研究的方式與成果，大異從前。而從各國佛教大學或佛教科系的林立，也都可以看出佛學在國際人文學術界所受的重視。然而，很可惜的是，學術界這種研究風氣對我國並未能有若何影響。國內沒有佛教大學或科系，也沒有任何專研佛學的常在學術團體，研究方法也少有人能邁步走出舊有的研究領域之外。

視野狹窄與國際研究狀況的不熟諳，是我國佛學

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才將近百年來外國佛教研究的成果，引介給國人。當然，外國著述並不一定盡善盡美，但是，去認識它們的方法、態度、與成果，則是現代中國佛學界所不可或缺的。這種認識，很可能是佛教研究全面革新的開始。

稍諳學術與出版狀況的人都知道，目前從事這一龐大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以我們目前的財力與人力，一定很難達到理想的標準。但是，我們堅信：「動手做一定比空口說要好！」因此，我們才不計較現實條件的不足，而毅然起步。

華宇出版社的朱蔣元、張光雄二先生，在極其困難的現實環境下，仍然毫不動搖地支持這件事。這種為佛法、為文化而傾力以赴的精神，決非徒然空口說白話的書生者流所能企及。這部書之能夠圓滿出版，兩位先生當是最直接的催生者。

李吉富

出版前言

本書爲兩部英文佛學名著的合刊。其一爲霍韜晦先生所譯的「歐美佛學研究小史」，其二爲陳銚鴻先生所譯的「佛教哲學——一個歷史的分析」。

此二書原爲香港法住學會所出版。法住學會是執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的霍韜晦先生所創辦的佛學研究團體。近數年來，該學會在香港佛教研究界發揮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導引不少知識分子以新方法研究佛學。此二書也是該會成果的一部份。由於原書出版於香港，國內讀者蒐求不易，因此商得法住學會同意，轉載於此，以饗國內讀者。

「歐美佛學研究小史」爲歐洲著名佛教學者，現任澳洲坎培拉國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狄雍（J.W. de Jong）所著。要瞭解百餘年來歐美的佛學研究情形，這部由第一流歐洲佛教學者所寫的著述，當是最可信賴的資料之一。

狄雍出生於一九二一年，畢業於荷蘭萊頓大學，並曾遊學美國哈佛大學及法國巴黎大學。早年曾任荷蘭萊頓大學教授。自一九六五年起，轉赴澳洲國立大學執教

。狄氏對印度學、佛教學的推展，頗有貢獻。

「佛教哲學——一個歷史的分析」為錫蘭學者加魯帕赫那（D. J. Kalupahana）所撰。作者曾任斯里蘭卡大學教授及夏威大學哲學系主任等職。著作除本書外，另有「因果——佛教哲學之中心問題（Causality : The 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等書。譯者陳銚鴻先生，為英國愛丁堡皇家外科學院院士，現在香港行醫。

霍韜晦先生於一九八一年起，也有「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的編譯構想，目前亦已出書二冊（即此處之二書），其所撰「編序」一文，對於有意提倡現代佛學的人頗有啟發性。茲附錄於本書卷末，以供讀者參考。

本書著者中文版序

正如前言中提到，「歐美佛學研究小史」這本書，原是我在一九七三年十月至十一月間到東京大學訪問時所作的一連串的演講（譯者按：指「東方佛學者」編者前言）。東大學生的反應，使我深受鼓舞。講稿後來發表在「東方佛學者」學報，而日譯本亦在東京出版。

霍韜晦先生費神把這本書譯成中文，刊登在「內明」月刊；現在又出版單行本，我很覺快慰。我希望本書對讀者們能有幫助。如有可能，我願聽他們的意見，以待有機會再版時訂正。

中國學者在過去對佛學研究曾作出如此偉大的貢獻，我希望他們繼續努力。如果本書能夠引起他們對外國某些成果的興趣，不管程度如何，我均感安慰。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於坎培拉，J·W·狄雍

FOREWORD

As I have explained in the foreword to my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this little book grew out of a series of lectures given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in October and November 1973. I was very much encouraged by the interest shown by the students of Tokyo University. The text of my lectures was published in the *Eastern Buddhist* and also in a Japanese translation in Tokyo.

I am very glad to see that Mr. Fok Tou-hui has taken the trouble to translate my book and to publish the translation, first in the periodical *Nei Ming* and now in the form of a book. I very much hope that the readers of my book will find something useful in it and, if possible, let me know their opinion. Perhaps it may be possible once to publish a second and revised edition.

Let me end by expressing the wish that Chinese scholars, who have made such excellent contributions to Buddhist Studies in the past, will continue their research. If my book can contribute to some degree to stimulate an interest in the work done in other countries I will be grateful.

Canberra, 12 November 1980.



J.W. de Jong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J.W." followed by "de Jong". The signature is fluid and cursive, with a diagonal line extending from the "J.W." towards the "de Jong".

本書譯者序

在世界佛學研究的領域中，狄雍教授（J.W. de Jong, 1921—）是非常傑出的人物。他在語言學方面的根底十分深厚，除當代各種歐西流行語外，還精嫻拉丁文、希臘文、梵文、藏文、巴利文、日文、中文，所以能夠飽覽各種不同語言的佛教原典與近代學者的研究成果。他的研究範圍十分廣泛，由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由南傳到北傳，由古典到現代，由東方到西方，凡是有關佛學和印度學的材料，他都幾乎涉獵到，以致養成豐富無比的目錄學和文獻學的知識。這次由他來替歐美的佛學研究歷史作一總結，人選恰當不過。

事實上，歐美的佛學研究一百多年來累積了大量成果，早應該作一檢討。無論是內容上的，或方法上的，哪些是名作，哪些值得參考，都應該給予評價，使年青一代的佛教學者知所選擇，充分利用。這樣，前人的努力纔不會白費，同時對今後的工作亦有指示意義。雖然，在歐洲和日本，常有文獻目錄之類的工具書出版，但祇是羅列篇名，沒有說明文字，對初學者來說還是不方便，最有幫助的就是這一種歷史性的評述了。

本書原為講稿性質。事緣一九七三年，日本學術振興會邀請狄雍教授到日本各大學作短期講學。為了使日本學者充分了解歐美的佛學研究成果，消除兩方的隔閡，促進學術上的交流、合作，於是選了這樣的題目，並受到一向注重文獻資料的日本學者的熱烈歡迎。講稿後來發表在大谷大學出版的英語學報「東方佛學者」第七卷、第一、二期（The Eastern Buddhist, Vol. VII, No. 1-2, 1974）。我所作的中文翻譯，就是以此為根據的。

在翻譯過程中，遭遇到不少困難。由於原著者引用多種語文材料，而我對於法文、德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希臘文都不熟悉，祇好請教別人，其中甘苦，也就不必多言了。幸好這樣的材料不算太多，否則真是難乎為繼的。全書譯出之後，第一章曾送友人曾錦涼先生校閱，承其費神提供意見，十分感謝。

我的另一個困擾是梵、藏、巴文的原典書名的翻譯。由於著者提到許多新材料，中國過去尚未有譯名，我未見原書，僅憑書名直譯，至感惶恐。後聞東京有日譯本出版（平川彰譯，題為「佛教研究の歴史」），因覓來對照一遍，發覺日譯本的處理比較簡單，祇採取對音方式，而且有遺略。中譯本自不能如此處理，我希望我的翻譯較少差錯。

本書曾在香港「內明」月刊連載（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此次出版，改正其刊誤之處頗多，亦有一些是我自己所作的更動，望讀者注意。

附錄四篇。其中之一是狄雍教授的著作目錄，由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〇年，文章幾達四百篇之多，令人咋舌，足證狄雍教授之賅博與敏銳。另外兩篇書評，一篇短文，更是狄雍教授學問功力的表現。一般文獻學家祇懂語言和目錄，義理方面的訓練較差，因此常為哲學者所輕視，而結果即引致文獻學與哲學兩條進路的相輕。但狄雍教授並非如此，我們從他評述別人的文章中，即可以看到他對佛教的基本概念，如「空」，如「涅槃」的認識深遠。這是文獻學與哲學的貫通，單憑文獻訓練，是不能全面客觀了解別人的。狄雍教授是西方著名的佛學書評家，下筆嚴正而有根據，作者們對他都是又敬又畏的，理由就是在他身上體現出佛學研究的應走之路。因此，我們再特地譯出他一篇短篇論文「中觀學派的絕對觀念」，讓中國的佛學研究者參考。

上述三篇附錄，初譯分別由林耀波、陳銚鴻、盧瑞珊三君執筆，再經我修改，因此若有錯誤，仍應由我負責。文獻查對曾遠煩劉楚華（留法）、史文鴻（留德）二君奔走，美意可感。復蒙原著者狄雍教授賜序，使中譯本增光。從序中我們可以看到狄雍教授對中國佛學界的期望，我們在感謝之餘，更應自勉。有關本書的校對及索引工作，則煩法住學會出版部同人擔當，謹於此致謝意。

一九八一年夏日 霍韜晦序於香港量齋

目次一

出版前言

歐美佛學研究小史

本書著者中文版序	I
本書譯者序	III
前言	1
本書使用之略號表	3
第一章 前期(公元前三〇〇——一八七七)	5
第二章 中期(一八七七——一九四二)	28
第三章 近期(一九四三——一九七三)	65
第四章 將來的展望	92
附錄一 評魏爾本著「佛教涅槃與西方解人」	103
附錄二 空——兼評史提連格著「空」	111
附錄三 中觀學派的絕對觀念	119
附錄四 狄雍教授著作目錄	125

目次二

佛教哲學——一個歷史的分析

本書譯者序	I
-------	---

本書使用之略號表	1
----------	---

原始佛教

第一章 歷史背景	3
----------	---

第二章	知識論	14
第三章	緣起論	22
第四章	存在的三大特色——三法印	29
第五章	業與輪迴	34
第六章	倫理與道德	43
第七章	涅槃	52
後期佛教		
第八章	部派與大乘佛教之興起	71
第九章	上座部、說一切有部及經量部	75
第十章	大乘佛教的發展	86
第十一章	中觀的超越論	99
第十二章	瑜伽行派的觀念論	108
附錄一	佛陀與形上學	116
附錄二	原始佛教與禪	124
翻譯名詞索引		137
香港霍韜晦主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原編序		1

前　言

我們現在給佛學研究的歷史作一個簡單的描繪，似乎不需要說什麼理由了。有大量研究資料，積存在各學者的著述之中，但還沒有一本書把這一段歷史作系統的整理。溫德殊（Windisch）的那本未完成的著作①，給我們提供了相當多的歐洲佛學界的研究消息，但大體上祇是敘述到十九世紀中葉，此後的數十年便幾乎空白。亨利·狄磊巴（Henri de Lubac），一位耶穌會的神父，也寫過一本有關佛教與西方遇合的書②，但他的興趣主要是放在西方社會對佛教思想的反應，而不是放在佛教研究的歷史上；佛教學者之所以重視它，是由於書裏有一章可以使我們看到十六至十八世紀時候，西方傳教士所記錄下來的佛教資料。最近魏爾本（G. R. Welbon）著「佛教涅槃與西方解人」（The Buddhist Nirvana and Its Western Interpreters）③，企圖把西方學者如何解釋涅槃的意義一一指出。但這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作，由於作者的學養並不十分足夠，以致此書使用起來不免減色④。除了上述三書之外，當然還有很多書刊提供有用的參考資料，其中最重要的，我們將會隨文提到。

本書的第一章，先略述西方在一八二五年以前的情形。雖然在該年之前，西方學者已有若干重要著作，但它們大部分都是未出版的，為人所知時已延至很晚。其次，本章將繼續提到由一八二六年至一八七七年時的研究情形。在這段期間，畢爾奴夫（Engene Burnouf）是最傑出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第二章則由一八七七年始，至一九四二

-
1. Ernst Windisch, *Geschichte der Sanskrit-Philologie und indischen Altertumskunde*, I, Strassburg, 1917, II, Berlin u. Leipzig, 1920;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 in Indien*. Drei nachgelassene Kapitel des III. Teils der Geschichte der Sanskrit-Philologie und indischen Altertumskunde, Leipzig, 1921.
 2. Henri de Lubac, *La rencontre du bouddhisme et de l'occident*, Paris, 1952.
 3. G.R. Welbon, *The Buddhist Nirvana and Its Western Interpreters*, Chicago, 1968.
 4. 參看拙著對該書的書評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1, 1972, pp. 396-403. 譯者按：即本書附錄一。

年止。這期間，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偉大的的學者，如薛尼溫·萊維（Sylvain Lévi）、魏萊·蒲仙（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海曼·奧頓堡（Hermann Oldenberg）、徹爾巴斯基（Th. Stcherbatsky）和賴斯·戴維斯夫婦（Rhys Davidses）等，都各有名作面世。第三章處理最近的情形，而最後一章將略舉一些學者們今後所要注意的研究工作。

在這簡單的素描中，要全面論列佛學研究的各項工作當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打算把重點放在文獻學（Philological studies）的研究上。從地域觀點看，印度佛教無疑是所論的中心，但對中國、西藏，以至南傳佛教的研究亦未完全忽略。祇有日本佛教和日本方面的佛學研究史不擬收進，因為這一個題材讓日本學者處理更為適當。

本書使用之略號表

AMG, B.V.	<i>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Bibliothèque de Vulgarisation</i>
AO	<i>Archiv Orientální</i>
BCL	<i>Bulletin de la Classe des Lett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i>
BEFEO	<i>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i>
Bibl. B.	<i>Bibliotheca Buddhica</i>
Bibl. Ind.	<i>Bibliotheca Indica</i>
BMFJ	<i>Bulletin de la Maison Franco-Japonaise</i>
BSOAS	<i>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i>
CPD	<i>Critical Pāli Dictionary</i>
GOS	<i>Gaekwad Oriental Series</i>
HJAS	<i>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i>
IA	<i>Indian Antiquary</i>
IHQ	<i>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i>
IJ	<i>Indo-Iranian Journal</i>
Ind. St.	<i>Indische Studien</i>
JA	<i>Journal Asiatique</i>
JAOS	<i>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i>
JASB	<i>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i>
J. Bombay Br. RAS	<i>Journal of the Bombay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i>
JIP	<i>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i>
JOR Madras	<i>Journal of Oriental Research, Madras</i>

JRAS	<i>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i>
MCB	<i>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i>
NGGW	<i>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in Gottingen</i>
OLZ	<i>Orientalistische Literaturzeitung</i>
RHR	<i>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i>
RO	<i>Rocznik Orientalistyczny</i>
SBE	<i>Sacred Books of the East</i>
SPAW	<i>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i>
WZKS	<i>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asiens</i>
WZKSO	<i>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 und Ostasiens</i>
ZDMG	<i>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i>
ZII	<i>Zeitschrift fü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i>
ZVORAO	<i>Zapiski Vostočnogo Otdelenija Russkogo Arxeologičeskogo Obščestva</i>

第一章 前期（公元前三〇〇——一八七七）

古代的佛教知識

遠在亞歷山大大帝之前，希臘人已經知道有印度⑤；自從亞歷山大征服印度（326—323 B.C.）之後，就知道得更多了。其中最重要的資料，是麥加士迭尼斯（*Megasthenes*）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出使波陀離勃多羅（*Pataliputra*）時所寫下來的一本書。這本書後來失傳，但許多希臘和拉丁學者曾經使用過它⑥。麥加士迭尼斯已提及沙門（*Sramanas*）和婆羅門。許多學者認為「沙門」即是指佛教徒，但按此語在阿育王碑文及巴利原典上的用法，則尚難如此肯定。希臘文獻中第一次正式提到佛教，是在麥加士迭尼斯之後五百年，亦即公元二百年左右，有一位住在亞歷山大港的神學家祈利文（*Clement*），在他的「雜錄」（*Stromateis*）中提到印度人歸依「浮駄」（*Boutta*，譯者按：即佛陀），並事之如神的事⑦。祈利文是一位住在亞歷山大港的學者，他有這樣的記述不足為異。當時亞歷山大港另有一位雄辯家狄安·基列梳斯多姆斯（*Dion Chrysostomos*），在一次對市民的演講中，就提及他的聽衆中有畢特利亞人（*Bactrians*）·契地亞人

-
- 5. W. Reese, *Die griechischen Nachrichten über Indien bis zum Feldzuge Alexander des Grossen*, Leipzig, 1914.
 - 6. B.C.J. Timmer 曾對麥氏之著作詳加研究。見 *Megasthenes en de indische Maatschappij*, Amsterdam, 1930. Recent literature on Megasthenes is given by J. Duncan M. Derrett, *Megasthenes, Der kleine Pauly*, 3 (Stuttgart, 1969), col 1150-1154.
 - 7. Strom. I. 15.71; cf. Timmer, op. cit., p.84-6; A. Dihle, *Indische Philosophen bei Clemens Alexandrinus*, *Mullus (Festschrift Klauser)*, München, 1964, pp. 60-70.

(Scythians)、和印度人^⑧。狄安·基列梳斯多姆斯死於公元一一七年。由此可見，在我們紀元後最初幾個世紀之中，亞歷山大港、羅馬和南印度、錫蘭之間，一直都有接觸^⑨。如果誠如尤西皮亞斯 (Eusebius 約二六三——三三九) 所說，祈氏的老師龐泰諾斯 (Pantainos) 真的遊歷過印度的話，那麼祈氏很有可能是對印度所知特多的人^⑩。有些學者相信：巴利聖典中亦有提及亞歷山大港的名字，不過寫作「亞拿山打」(Alasanda)；此字在「彌蘭王問」(Milindapañha) 中出現四次 (V. Trenckner 校訂本, 82. 23–24, 327.27, 331.18 及 359.29) 在「大義釋」(Mahāniddesa) 中出現兩次 (P. T. S. 本, 155.5, 415.11)，在「大史」(Mahāvamsa) 中出現一次 (XXIX. 39)^⑪。不過，關於此說，學者們的意見尚未一致。

新利文之後兩百年，希羅尼密斯 (Hieronymus, 約三四七一四一九) 亦提到佛陀。他說佛陀是從一名處女的脣下出生的^⑫。

巴拉姆與約瑟弗的傳說

此後數百年間，西方對佛教再無所知。中世紀時，基督教界崇拜兩聖徒：巴拉姆和約瑟弗 (Barlaam and Josaphat) 有關他們兩人的傳說十分流行，而且被譯成多種語言：希臘語、拉丁語、法語、

-
8. Ad Alexandrinos 32, 40. 譯者按：畢特利亞乃位於西北印 Oxus 河與 Hindu-Kush 山脈之間的古國。契地亞則位於黑海東北，今屬蘇聯。
 9. J. Filliozat, *Les échanges de l'Inde et de l'Empire romain aux premiers siècles de l'ère chrétienne*, *Revue historique*, 201, 1949, pp. 1–29; Ét. Lamotte, *Les premières relations entre l'Inde et l'Occident*, *La Nouvelle Clio*, 1953, pp. 83–118 R. Delbrueck, *Südasiatische Seefahrt im Altertum*, *Bonner Jahrbücher* 155/156, 1955–6, pp. 8–58, 229–308; Franz F. Schwarz, *Neue Perspektiven in den griechisch-indischen Beziehungen*, *OLZ*, 67, 1972, col 18–21.
 10. Eusebius h. eccl. 5. 10. 譯者按：尤氏乃為基督教思想家。
 11. 參看 H. de Lubac, *op. cit.*, pp. 13–16; *Critical Pāli Dictionary*, 1, Copenhagen, 1924–1948, pp. 441–442.
 12. Hier. adv. Iov. 1, 42; cf. A. Dihle, *Buddha und Hieronymus*, *Mittel-asiatisches Jahrbuch*, 2, 1965, pp. 38–42. Foucher, *La vie du Bouddha*, Paris, 1949, p. 357: *Traditur quod Buddam, principem dogmatis eorum, e latere suo virgo generarit*. 譯者按：希氏亦為另一基督教思想家，曾學於羅馬。

德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普羅旺斯語 (Provencal)、近代希臘語、荷蘭語和北歐日耳曼語 (Scandinavian)，在中世紀歐洲傳播。因此，當後來佛陀的故事傳至歐洲，大家都因為它和約瑟弗的傳說相似而注意起來。最初指出這一回事的，是一位編輯馬哥李羅作品的姓名不詳的編者，他在馬哥李羅所記的一篇佛傳之後加上按語說：「此一傳說，與吾人讀到之聖教父傳記中之聖約瑟弗傳極為相似。聖約瑟弗亦為印度某地阿噠尼王 (King Avenir) 之子，後來由於巴拉姆之化導而改宗基督教。」^⑬ 約在一六一二年，葡萄牙歷史學家狄奧果·度孔圖 (Diogo do Couto)，記述葡萄牙人在印度的開發事業時，談及約瑟弗，說他：「在其傳說中扮演一印度大王之子，他所受的教育與全部細節均與吾人在佛陀傳中所列舉的相同……由於他是印度大王之子，吾人上文已指出，他很可能就是那充滿奇蹟的佛陀。」^⑭ 不過，等到學者們確認約瑟弗傳說與佛教的淵源時，已是十九世紀了^⑮。一八五九年，有關這個問題的研究即不斷有文章發表。一八九四年，安尼斯特·古安 (Ernest Kuhn) 出版了他的著作，把一八五九年以後所有的研究成績作了一個全面的總結^⑯。

然而，最近格魯吉亞文 (Georgian) 抄本的發現，使這一傳說的過程又引起了新的討論。據 D. M. 朗格 (Lang) 和格魯吉亞文學者們指出：有關此傳說的格魯吉亞文抄本原有兩種：一種是較古的，也是較完整的，從時間上看，可能在九或十世紀之間寫定；另一種是較短的，而且是在前者基礎上作成的。這兩個傳本 D. M. 朗格都譯

13. 參看 L.F. Benedetto (ed.), *Marco Polo. Il Milione*, Firenze, 1928, p. CLXXXVII, n. 1; A.C. Moule & P. Pelliot,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I, London, 1938, p. 410. 譯者按：巴拉姆與約瑟弗之傳說，最初傳為一敘利亞僧人 John Damascene 的著作。內容敘述約瑟弗乃印度某國王子，生於深宮之中，從不知生老病死之苦。後受基督教隱士巴拉姆引導而信奉了基督教。除結局外，其早期生活與佛陀極相似。

14. 參看 D.M. Lang, *The Wisdom of Balahver*, London, 1957, p. 12.

15. Laboulaye, *Journal des Débats*, 26 Juillet 1859; Felix Liebrecht, *Jahrbuch für romanische und englische Literatur*, II, 1860, pp. 314-334.

16. *Barlaam und Joasaph. Eine bibliografisch-literaturgeschichtliche Studie*. München, 1894.

成了英文^⑯。看來，這個較古的格魯吉亞文傳本是基督教徒根據阿拉伯原文改編過來的。可能，在八世紀末，原來用柏列維語（Pehlevi譯者按：即三至九世紀流行之中古波斯語）寫成的幾本有關佛陀的書，如：“A book of the Buddha”, “A Book of Balauhar and Budhasaf”（佛陀與菩薩？譯者按：此中Balauhar與Budhasaf兩字，疑即Buddha與bodhisattva的訛音。由於阿拉伯文書寫上的形似，遂轉訛為巴拉姆與約瑟弗），“A Book of Budhasaf by himself”等，已被譯成阿拉伯文。這些阿拉伯傳本，現存最完整的已於一八八八年在孟買出版，後來又由V. R. 羅先（V. R. Rosen）譯為俄文，尋於一九四七年由克拉茲果夫斯基（Kracikovsky）出版^⑰；但有關帕列維語傳本的事却全不見提及。朗格假定，巴拉姆與約瑟弗的傳說最初是在中亞一帶的摩尼教徒中流傳，因為有一段古突厥文的殘本提到悉達多太子和病人會見的故事。但是，如果要為這一傳說向印度找資料，則其中頗多寓言不一定淵源於佛教；學者已經指出：在「五卷書」（Pañcatantra）及「摩訶婆羅多」（Mahābhārata）中亦可以找到。很可能在漢譯佛典中亦有與此傳說相類似的故事或章節。我們很希望日本學者能夠研究這些最古老的、同時也是易於獲取的傳本（即格魯吉亞古本與阿拉伯傳本），跟那些尚未被學者翻查的漢譯佛典比較（譯者按：本書原為作者向日本學者的演講稿，故有此語）。格魯吉亞本後來在公元一〇〇〇年左右被譯成希臘文，再由希臘文譯成拉丁文（公元一〇四八年），由拉丁文再進一步被譯成各種歐西語。

羅馬教皇派赴蒙古的使節與馬哥孛羅的旅行

西方世界和佛教在亞洲的首次接觸，是在十三世紀羅馬教皇因諾增爵四世（Innocent IV, 公元一二四三——一二五四年在位）派遣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修道士（Franciscan and Dominican friars）出使蒙古汗的時候。當時，其中一位使者是意大利方濟各會修道士皮安·狄迦比那（Pian di Carpino, ?-1252），他在一二四五年離開里昂，翌

17. *The Wisdom of Balahvar*. London, 1957; *The Balavariani*, London, 1966.

18. *Povesti o Barkaame i Iosafe*. Moskva-Leningrad, 1947.

年抵達中央蒙古的營地（譯者按：指拔都營地，其時正為蒙古軍遠征歐洲之後）。一二四七年，他回到法國，並撰寫「蒙古史」（*Ystoria Mongolorum*）。書中，他提到契丹的宗教（譯者按：當時西方人以契丹 *Kitai* 稱遼，而誤以為南宋亦契丹人），以一種基督教的口吻寫道：

「上文所提到的契丹人，都是外教人。他們有自己獨特的文字，有我們所稱的新舊約，有教父的傳記，也有隱修士、和教堂般的屋宇，以供規定時間內祈禱之用。他們承認有聖賢存在，恭敬一位真主，相信主耶穌基督，相信永生，但絕少洗禮。他們亦敬重我們的聖經，對基督徒友善，好施捨。他們都是善良而有人情的人。」（*Sinica Franciscana I*, pp. 57–58）。

這一段話，正如狄磊巴斷定：很明顯地是指中國的儒者而不是指佛教徒。其後跟着提供佛教資料的，是一個佛蘭芒（Flemish）方濟各會的修道士威林·溫·勞思布洛克（Willem van Ruysbroeck），一二五四年間他在哈喇和林（Karakorum）住了六個月。他在他的「旅行記」（*Itinerarium*）中，相當正確地描述了西藏喇嘛，甚至提到了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彌、吽」（*Om mani padme hūm*, 或作 *Ou man baetavi*, 及 *On man baccam*, *Sinica Franciscana*, I, P. 230）。

不過，對佛教作最全面的記述，則是在馬哥孛羅（Marco Polo）的「遊記」（*Divisament dou Monde*）中。馬哥孛羅由一二七五年起，至一二九一年止，住在中國。書中記載他抵達沙州（*Sa-chau*, 即敦煌），看到中國佛教徒的情形：

「此地（沙州）亦名唐兀（Tangut），居民都是偶像崇拜者，只有一些屬於巖斯托里派（Nestorian）的土耳其基督徒和一些回教徒（Saracens）例外。這些偶像崇拜者使用自己的語言，不靠貿易，而從事農耕以獲取穀物。建有頗多寺院及修道院，裏面置滿各種偶像，以便他們崇拜和進奉供物。」（Ronald Latham 譯本，London, 1958, pp. 54–55）

在同書中，馬哥孛羅提到了西藏佛教；談到錫蘭時，更對佛陀的生平作了一個相當可靠的、精簡的說明。關於「亞當山」（Adam's Peak），